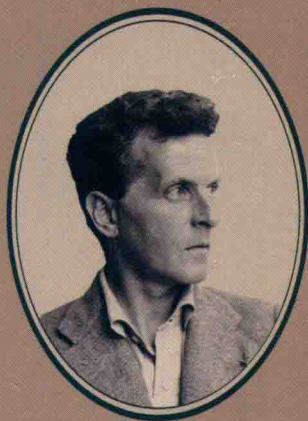




Wittgenstein in Cambridge: Letters and Documents 1911-1951

维特根斯坦剑桥书信集

1911-1951



[英] 布瑞恩·麦克奎尼斯 编

张学广 孙小龙 王策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Wittgenstein in Cambridge: Letters and Documents 1911 – 1951

维特根斯坦剑桥书信集

1911–1951

[英] 布瑞恩·麦克奎尼斯 编

张学广 孙小龙 王策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特根斯坦剑桥书信集:1911—1951/(英)布瑞恩·
麦克奎尼斯编;张学广,孙小龙,王策译. —北京:商务
印书馆,2018

ISBN 978-7-100-16459-7

I. ①维… II. ①布…②张…③孙…④王… III.
①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Ludwig 1889-1951)—
书信集 IV. ①B561.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7398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维特根斯坦剑桥书信集:1911—1951

〔英〕布瑞恩·麦克奎尼斯 编

张学广 孙小龙 王策 译

商务印书馆 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 发行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645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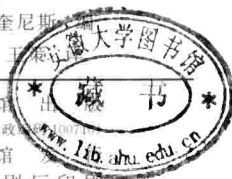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49

定价:136.00 元



目 录

鸣谢.....	1
导言.....	5
书信和文件清单	25
书信和文件	49
参考文献.....	746
通信者和文件来源索引.....	762
索引.....	764
译后记.....	778

鸣 谢

编者对如下机构和个人慨允本书在文本和注释中使用其版权材料表示感谢,感谢剑桥三一学院准许使用维特根斯坦的所有著述和学院的其它材料;感谢剑桥大学档案馆保管人允许摘录官方函件、备忘录和档案;感谢安大略省汉弥尔顿市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伯特兰·罗素档案馆;感谢剑桥国王学院准许使用凯恩斯的所有材料;感谢蒂姆·摩尔先生;感谢简·伯奇(Jane Burch)夫人和匹兹堡大学图书馆(特色馆藏)准许使用拉姆塞的材料;感谢皮兰格劳·伽雷格纳尼(Pierangelo Garegnani)教授允许使用皮耶罗·斯拉法的信件和笔记;感谢伊丽莎白·冯·特赖夫人、佩吉·拉什·里斯夫人(还包括约里克·斯密特斯的信件)、鲁丝·马尔科姆(Ruth Malcolm)夫人。

有一两封信尽管想尽办法,还是没能找到版权的持有人——比如爱丽丝·安布罗斯、尼古拉·巴赫金和J. 泰勒的情况。R. B. 布雷斯威特和约翰·克兰普汉姆爵士的来信,感谢剑桥国王学院;H. S. M. 考克斯特的来信,感谢苏珊·考克斯特·托马斯(Susan Coxeter Thomas)夫人;L. 古德斯坦的来信,感谢索菲娅·辛格(Sophia Singer)夫人;雷蒙德·普里斯特利爵士的来信,感谢约翰·胡波特(Jahn Hubert)先生;瑞德帕斯的来信,感谢萨

拉(Sarah)夫人和欧菲利娅·雷德帕斯(Ophelia Redpath)女士;斯蒂文森的来信,感谢诺拉·L. 斯蒂文森(Nola L. Stevenson)夫人;G. 和 K. 汤姆森的来信,感谢 M. 阿莱克秀(M. Alexiou)教授;W. H. 沃森的来信,感谢彼得·沃森(Peter Watson)荣誉教授和凯奈特·沃森(Kenneth Watson)博士;J. 韦斯顿的来信,感谢 T. 韦斯顿先生。感谢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遗产的代理者苏格兰作家协会慨允重印他的书信体诗文;感谢迈克尔·伊格纳迪夫(Michael Ignatieff)先生以及查托和温达斯(Chatto & Windus)出版公司允许重印其《以赛亚·柏林》(由兰登书屋允许重印)中的一段;感谢贝拉·波罗巴斯(Béla Bollobás)教授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允许重印《李特尔伍德杂录》的摘要;感谢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夫人允许重印她以玛丽·斯库卢腾(Mary Scrutton)为名所写的书评摘要;感谢《心》的编辑允许重印维特根斯坦和布雷斯威特的来往书信。研究过程中所收到的信件,我未分别表达谢忱而冒昧印出,在此满含感激。

- vii 罗素致奥托琳·莫雷尔夫人的书信存放在奥斯丁的德克萨斯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维特根斯坦本人和爱丽丝·安布罗斯致查尔斯·斯蒂文森的信件存放在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图书馆。感谢这些图书馆及其职员慷慨帮助并允许复印。感谢我们这里使用了其大量材料的其它图书馆——三一学院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手稿分部(保留着卷帙浩繁的摩尔往来信件),维也纳的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许多以前私人手中的信件现收集在此),满足了各种需求的牛津大学图书馆现代手稿阅览室。安大略金斯顿女王大学的同事大卫·班克胡尔斯特(David Bakhurst)教授和 E. J. 泰德·

邦德(E. J. Ted Bond)教授在最短时间内让我得到维特根斯坦致 W. H. 沃森信件的抄本,我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这些信件的存在。因斯布鲁克大学布伦纳档案馆发挥了特殊作用,它保存有某些原件,但据我所知只有它试图保存维特根斯坦所有往来信件的副本和抄本,并富有成效地制作了 InterLex 过世大师系列 CD-ROM 或订阅网站中的完整往来信件(迄今为止最为完整)。评论和大部分支撑材料至今还只是德文。新的材料,比如本书中首次出现的斯拉法往来书信和其它信件,也将及时增补。该档案馆的资源一直供我随意使用,所以我特别感谢约翰·豪赛尔(Johann Holzher)教授(馆长)和阿兰·詹尼克(Allan Janik)教授,后者负责那里的维特根斯坦项目,他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与背景进行了超过 30 年的研究,已成为我非常珍视的同事。

编辑本书的念头归功于三一学院图书馆员 D. 麦基特里克(D. McKitterick)博士,感谢他的一贯支持。学院档案管理员乔纳森·史密斯(Jonathan Smith)先生投身于本项目,仿佛这是他自己的事儿。大学的代理档案管理员杰克·考克斯(Jacky Cox)小姐同样热心,她回答问题迅捷,常常只要一提内容便迅速找到我所需要的材料。她先前是国王学院现代档案馆的保管人时便已如此。从维特根斯坦世界迈入斯拉法世界,我从当地居民的合作中受益良多,尤其是格拉茨的海恩茨·库尔兹(Heinz Kurz)教授和罗马大学的奈丽奥·纳尔迪(Nerio Naldi)教授。罗汉普顿和剑桥的阿瑟·吉布森(Arthur Gibson)教授(他熟知两个世界)使我在最短时间查到文件。在材料准备出版时,我完全依赖锡耶纳的安娜·库姐·纳恩兹安特(Anna Coda Nunziante)小姐的大力帮

助，她与我一起工作多年，在标准的严格抑或热情投入方面从未懈怠。我对她以及无数（多到难以数计的）朋友千恩万谢，他们解决了许多问题。在帮助我的众多人中最后尤其要感谢我出版商的文字编辑瓦列里·罗斯（Valery Rose）和杰奎琳·哈维（Jacqueline Harvey），她们逐渐适应这一复杂多变的项目，最终被搞得精疲力竭。

布瑞恩·麦克奎尼斯

2007年6月于锡耶纳

导 言

本书收录的往来书信和文件,显示剑桥、剑桥的朋友和机构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生涯、职业活动和一般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当然,深深影响了他生活的这方面的重大事件或私人事项也必然被触及——两次世界大战,奥地利的被吞并,他的职位或对职位的谋求,他的健康,等等。

本书非常不同于上一本《剑桥书信集》,后者由我和已故的乔治·亨里克·冯·赖特编辑(Blackwell,1995)。该书只包含所发现的维特根斯坦与其剑桥主要朋友间的往来信件,这里指的是那些与他地位相当的朋友甚或导师而不是门徒——伯特兰·罗素、G. E. 摩尔、J. M. 凯恩斯以及后来的弗兰克·拉姆塞和皮耶罗·斯拉法(只有一封但很重要的信件)。本书大大增加了斯拉法的篇幅,因为维特根斯坦致他的大量信件和他写给维特根斯坦的一些便柬已被发现(或已公开)。这使我们对他们间对话的看法不再只是猜测,维特根斯坦将其《哲学研究》的很多灵感归于这一对话。它们也显示了维特根斯坦对其祖国奥地利被吞并和战争来临的反应,这些事件纠缠在一起迫使他依旧做哲学家。

斯拉法的材料本身应是对上一本的极其珍贵的补充,而且在剑桥三一学院图书馆员(大卫·麦基特里克博士)和我的出版商

(我已与 Blackwell 往来超过 40 年)的鼓励下,我决定改变本书的初衷,收进反映维特根斯坦与其追随者、学生、朋友或年轻同事间往来的信件。原则上我只限于学术领域,而放弃与剑桥朋友更为私密的往来信件,它们的确并不太多,而且大多是(在弗朗西斯·斯金纳的情况中完全是)写给维特根斯坦的,而不是维特根斯坦写的。² 即使有维特根斯坦的回复,通常也是讨论别的什么问题。完全的前后连贯几乎不可能,所以,一两封劝告信只好暂且牺牲掉。完整的维特根斯坦往来信件(我是编者之一)可见于 CD-ROM 和互联网上 InterLex 过世大师系列,它间或有所更新。(但注释和相关材料至今仍只有德文。)

本书的新材料几乎完全来自 1929 年开始的维特根斯坦第二个剑桥期,来自他想使布卢姆斯伯里年轻子弟变得严肃的最初尝试之后;这些材料表明他面对更认真成熟的哲学学生,而 30 年代之后的学生和追随者,尤其是拉什·里斯、诺曼·马尔科姆和冯·赖特,他们的往来和友谊伴他至终。^① 来自罗素、凯恩斯和摩尔的个人信件仍完整印出,尽管我现在删去了确定或请求见面的便柬。对于其它情况,我这里节录致维特根斯坦的一些信件,删除关系不大的材料。维特根斯坦自己的信件则完整留存。

相对前一本书信集的另一主要变化和增补是,本书收录维特根斯坦参加或主持的会议和讨论的一些记录,还有间或涉及他正式职务的文献。将来人们还会赏识这些档案吗?一想到三一学院

^① 本书未能包括与 M. O'C. (肯)德鲁利的往来信件(我觉得仍未佚失),后者是他交往最久的最亲密朋友。他们的友谊和思想交流描述于 M. O'C. 德鲁利的《语词的危險和論維特根斯坦》(Bristol: Thoemmes Press, 1996)。

数学学会的那些年轻秘书，在去计算来自法国海岸的潮汐效果之前，将会议记录和维特根斯坦的话语记入这些皮革封面的卷宗，便令人感动。杰克·考克斯（剑桥大学代理档案管理员，以前是国王学院的现代档案管理员）和乔纳森·史密斯（三一学院档案管理员）不仅允许我接近这些珍宝，而且对我极度慷慨热心。

跟之前的书信集相比，本书既非维特根斯坦及其圈子的首次介绍，亦非其旧雨新知的百科全书。但是，若能传达维特根斯坦生活和工作的近乎轮换模式的完整画面，它的出版便是值得的：与他人互动的时期，以及退回自身沉思他从这互动得到的且将之归于这互动的思想时期。他所有的思想发展，亦即他的全部生活，都以对立和内在冲突为特征。他及其同代人的书信表明，他既是害羞敏感的，又是尖刻挑剔的，既是乐于合作，又是坚信自己判断的。许多争吵和近乎同样多的和解被记录下来。他在出版《逻辑哲学论》上的挣扎有迹可循，他明显想退出学术界，被凯恩斯和拉姆塞央求着回到哲学，后来又不断想离开哲学，所有这些最终都反转了。他常常到了出版某些东西的边缘，然后却追求某一新的完美理想，或者他人在讨论中提出的或自己漫无目的广泛阅读中发现的某一新题目。他走向确实性（缘于摩尔和马尔科姆）和颜色（最后一次访问维也纳时拿到歌德的一部书）就是这种情况。其结果是，手稿中的许多著作残片留给了他的朋友们去清理。尽管他常常表达出某种不信任，某些事件以及某种吸引力还是一再将他带回剑桥。对他来说，这跟他的孤独感一样重要。

1911年10月18日^①，维特根斯坦拜访了当时为剑桥的一名

^① 那天有罗素致奥托琳·莫雷尔女士的信。

讲师的罗素,好像一直待到圣诞节,尽管他秋季学期仍在曼彻斯特大学注册学习。1912年2月1日,他被接受为剑桥大学和三一学院的一员。起初是一名本科生,到6月开始,道德科学特别董事会的学位委员会接收他为研究课程的高级学生,并“请伯特兰·罗素先生慷慨担当该生的指导教师”。^① 维特根斯坦参加了G. E. 摩尔(当时还不是教授)的讲座,并接受逻辑学家W. E. 约翰逊的指导(两人都颇感受挫)。维特根斯坦1912年三个学期和1913年斋和复活节学期都住校。1913-1914学年的大部分时间在挪威度过,自己在思考写作,G. E. 摩尔在4月访问了他。夏季维特根斯坦返回了奥地利,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后,他自愿参加奥匈帝国军队。

来到剑桥证明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转折之一。他不得不做出令他苦恼的选择,是做一名航空工程师,还是做一位思想家。罗素帮他做出了我们都知的选择,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把他引入其才智能在其中得到自由发挥的群体。周围是摩尔、凯恩斯、斯特雷奇甚至年轻的追随者(当时实际上是布鲁姆斯伯里的剑桥分支),这对他来说是新鲜的经历。他的家庭背景属于财富和高雅文化那一类,而不是这一新环境所养成的那种理智。他确实已有新的和实际的科学知识,这使他不能容忍夸夸其谈,但是平心而论,对万事万物热烈的理智讨论,不管是讨论过程还是讨论结果,对他来说都是全新的(就我们所知而言)。他到剑桥(就像圣奥古斯丁到达迦

^① 1912年6月5日J. N. 凯恩斯(J. M. 凯恩斯的父亲和大学教务主任)致W. M. 弗莱彻(三一学院导师)的信。

太基)对他的生命极其重要,他也很在此终老。“此地乃启蒙之所,智慧之源”(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是剑桥大学的校训之一:他在此找到了适合他的问题和方法。当然,他是奥地利人(或者像他和罗素所说的,日耳曼人),英式生活的许多方面让他不安,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他的大部分生活,那么奥匈帝国的精神架构也让他不得安宁。

愉快地选择罗素为指导教师(罗素也很快接受了)后,维特根斯坦发觉自己几个月来都置身于一群精英中,这群人认可自己的社会角色(我想维特根斯坦也一直这样认为),完全觉得自己的理想高于追求世俗成功的人的理想,他们认为世俗成功是剑桥大学所鼓吹的。他们在摩尔的《伦理学原理》(有趣的是《数学原理》也仿照它命名,而不是用其它方式)中找到自己的圣经,而现在想着(依罗素看)过花前月下、良辰美景的退隐生活。年轻人也倾向于彼此关爱。我们涉及了与圈子中长者的讨论:维特根斯坦坚持认为,数学会提升一个人的品位,因为品味得自真诚的思考。他们全都反对他,这也许是典型的情况。总之他试图离开学会(使徒社),觉得那些年轻人“还没梳理好自己,这一过程尽管必要,但不甚得体”。(他作为高级成员重新加入学会则是很久以后的事儿。)

除了年轻人的不成熟外,他对他们有什么反对意见?他批评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一方面批评它的风格(“含糊的东西不能通过重复而获得一丁点儿清晰”),另一方面也批评它的内容:它打算描述善的本性。维特根斯坦不要别的,只要诚实,只愿成为(正如罗素迫使他说出的)一个充满热情的人。他的冲动强烈但从不是可耻的,原则之类东西似乎对他毫无意义。学会的那些脆弱论证

(人们仅仅因为喜爱论证而为矛盾之物或可耻之事辩护)对他来说难以容忍。还有另一件事：所有人，甚至那些长者，都缺乏他所谓的敬畏：哪怕罗素(这时候他仍然尊敬罗素)也如此平庸以至于沾沾自喜于相对以前时代自己时代的优越性。对世界明显抱尼采态度的劳伦斯出于类似原因也对布鲁姆斯伯里颇感不爽。

但也正是在摩尔和罗素之间，小组成员使他去写作他的第一部某种意义上也是最伟大的著作。他要修补罗素的逻辑；他在两三段中要处理凯恩斯的概率问题；他要表明伦理学——摩尔的领域——不是由命题构成的。这也许正是他们从他那里想得到的东西：正如罗素告诉维特根斯坦姐姐的，他们“渴望在他那里看到哲学的下一重要进展”；而一战后他们高兴地(正如布罗德所说的)“在维特根斯坦先生长笛的高度简约的奏鸣曲中翩翩起舞”。他们还在其它方面帮助了他——他们接受他本身就是一种恩赐。在他们中间，“他找到了一位来自上天的朋友，而这正是他所渴望的”，尽管后者不完全在这个圈子里，他的这部伟大的著作就是献给他的。

他1915年告诉罗素完成的《逻辑哲学论》初稿就是这一剑桥阶段的成果，而1916—1918年间所作的补充(论上帝、自由和神秘者的部分)可说更多地是他生命后两个阶段形成的。托尔斯泰的宗教在战争时期吸引了他，而他在奥洛穆茨(Olmütz)碰到的克劳斯和鲁斯的那些年轻门徒的圈子起着助产士的作用，让他说出一些话，这些话他以前就想到了，并且像他自己所认为的，必然留着未说。^①

① 关于奥洛穆茨圈子，见保罗·恩格elman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来信及回忆》，布瑞恩·麦克奎尼斯编(Oxford: Blackwell, 1967)和我的《青年路德维希》(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5)第246页以下。

罗素对这样的神秘主义感到震惊,而有一丁点儿宗教痕迹就足以让某人从布鲁姆斯伯里社交圈中被放逐。“我们已失去汤姆”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对 T. S. 艾略特皈依的评论。

除了这点无关因素,正如他认为的,这本书使罗素着迷。它由意大利卡西诺的战俘营转来,1918 年奥匈帝国投降后,维特根斯坦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俘虏生活,直到 1919 年 8 月。他带着被摩尔称为《逻辑哲学论》的完整手稿,经过凯恩斯的斡旋被安全带往英国。

1919 年 12 月,亦即从战俘营释放不久,维特根斯坦能够在海牙(显然有必要前往一个中立国)与罗素会面,两个朋友在此对该书进行了热烈讨论(书信 65-76)。返回英国后,罗素给该书写了导言(维特根斯坦对之并不认可),还以其它方式帮助该书以德文和英文对照本出版(书信 88-96)。两人还在 1922 年会面于因斯布鲁克(见 95 的注释)。这次会面某种程度上是不愉快的,此后他们的友谊再也没有恢复到从前,尽管一开始还有几封亲切的书信(96-97)。

后面几年,维特根斯坦将他的全部财产交给家庭,脱离哲学变成了下奥地利偏僻村庄的小学教师(1920-1926),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中断了与剑桥的联系。在 1923 年年初,他写信给凯恩斯试图恢复联系(书信 98)。一年时间未能得到回信,但同一时间(1923 年 9 月)凯恩斯的一位年轻朋友,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弗兰克·拉姆塞(他曾为 C. K. 奥格登翻译《逻辑哲学论》),从剑桥看望身在施内堡山麓普赫贝格的维特根斯坦。他似乎在此待了至少两周,每天与维特根斯坦长时间讨论,后者向他解释了《逻辑哲学

论》。这些交谈的结果之一是对德文本和英文新版所做的一系列订正，其中大部分纳入 1933 年的第二次印刷。^①毫无疑问，拉姆塞的报告激发了凯恩斯的巨大的努力，帮助维特根斯坦返回剑桥（见书信 111、112 和 115）。有证据表明，1923 年秋天维特根斯坦本人曾考虑放弃当时教师工作而回到剑桥完成学位的可能性。但是，一年以后，他回绝了凯恩斯的邀请，向凯恩斯本人和拉姆塞解释了理由，后者再次前往奥地利访问。

然而，1925 年 8 月，维特根斯坦的确访问了英国，跟凯恩斯待在一起，会见了拉姆塞和其他朋友。凯恩斯承担了这一行程的费用（书信 110—111）。这还与布鲁姆斯伯里典型的理智的和个人生活之间的相互交织一起发生。凯恩斯新近与可爱但好发奇想的丽迪雅·洛普科娃结婚：这些天确实还是他们的蜜月期。拉姆塞也处在结婚前夕，但不得不离开新娘前往苏塞克斯，以便维特根斯坦能有个交谈的人。吉奥弗里·凯恩斯及其夫人应邀打理聚会，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伦纳德·伍尔夫从邻近前来帮忙。我们从其他出处了解到这事儿——布鲁姆斯伯里人接受了丽迪雅的突发奇想；主题的这一有点随意的改变使维特根斯坦很不满意，因为不是让他出席一场辩论会；维特根斯坦与拉姆塞进行长时间的散步，这使他们有机会在精神分析问题上发生争吵。（争吵已被证明，主题可能是这个。）所有这些事件推迟了他重返剑桥和哲学。

还有两件事交叠着，每个都值得分别叙述：昆德曼街的房子

^① 见 C. 莱维“关于《逻辑哲学论》文本的注释”，《心》，76（1967 年），第 417—423 页，以及书信 99、107 和 152。

修建(某种意义上返回去关注奥洛穆茨社交圈),以及与此交错着开始与维也纳学派一些成员的适当讨论。^①然而,出于多种原因,我们可以轻易猜测,维也纳不是他的工作之地:他只是个富有的业余爱好者,除非他放弃全部资产;并因此似乎是个依附自己家族的家伙。剑桥才是归宿之所,于是1929年年初他返回弗兰西斯·康福德的剑桥,“那人准备演讲,长衫随风飘扬的剑桥”。他在此受到热烈欢迎,既因为他还是弱冠青年时就已为人知晓,亦因为他现在在学术界已有名望。这一故友圈子保护他(尤其在三一学院)免受不时而来的谴责。^②

凯恩斯向丽迪雅写信说,“上帝到了”,的确维特根斯坦开始主导了他们的生活。先待在国王学院的客房,然后与拉姆塞待一起(他们忘记了之间的争吵),两种情况都超过了正常的时间。他们将他与当时年轻人和左派的导师莫里斯·多布安排在一起,在此他重续16年前的生活,让自己平心静气地面对这一切。他与摩尔的争吵也很快翻过去了——这也许是充满着希望的时期,维特根斯坦的个人魅力还没有因为他对他人和对自己的要求而变得暗淡。

① 第一手资料见赫伯特·费格格的“维也纳学派在美国”,载《美国历史的视角》,第2卷(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第639页;卡尔·门格勒的《维也纳学派回忆录》各处,B.麦克奎尼斯、L. Golland 和 A. Sklar 编(Dordrecht and Boston: Kluwer, 1994)。《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F. 魏斯曼记录的对话,B. F. 麦克奎尼斯编,B. F. 麦克奎尼斯与 J. 舒尔特译(Oxford: Blackwell, 1978)(德文版, *Wittg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 B. 麦克奎尼斯编(Oxford: Blackwell, 1967)),包含着总的说明和后期对话。

② 一位著名古典学者写信给我说:“他似乎忽视了,研究员职位不仅有特权,而且有某些责任”。但是,接近董事会(“三一学院高层”)的利特尔伍德、哈代和其他人都体谅他。